

· 教育与心理 ·

从“表征”到“共生”：共生认知心理学探析

周卓钊^{1,2} 袁 平¹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2.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海口 570000)

摘 要:共生认知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认知心理学学派,是对以“表征”为研究纲领的传统认知心理学最具革命性的挑战,因其在心理学方法论层面从现象学、实用主义、规范主义三个转向,实现对传统认知心理学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目前,瓦雷拉自创生研究方案、诺伊感觉运动研究方案、赫托激进化共生研究方案、德耶格交互共生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发展并完善该学派理论。文章对其历史功与过、现实是与非分别进行了评述,认为未来还应该注重对4E认知理论的整合,研发成熟研究技术,摒弃蕴含于此学派理论中非此即彼的二歧思维,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推动心理学理论健康发展。

关键词:表征认知心理学;共生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新学派;理论述评

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9)06-0104-10

doi:10.19642/j.issn.1672-8505.2019.06.012

From Representation to Symbiosis: An Analysis of Enactive Cognitive Psychology

ZHOU Zhuo-zhao^{1,2} YUAN Ping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2. Hainan Provincial Health Commission, Haikou, Hainan, 570000, China)

Abstract: Enactive cognition psychology, as a new schoo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s the most revolutionary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cognitive psychology, which takes “representation” as its research program. Because of its shift from phenomenology, pragmatism and normativism in psychological methodology, enactive cognitive psychology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raditional cognitive psychology. At present, four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Varela’s autopoiesis research approach, Noe’s sensorimotor research approach, Hutto’s radical enactivism research approach and De Jaeger’s inter-enactivism research approach, have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such school’s theor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is paper makes comments on it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mistakes, and the realistic rights and wrongs.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integration of 4E cognitive theory and development of mature research techniques. It is better to abandon the binary thinking embodied in enactive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representative cognitive psychology; enactive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schoo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ory review

收稿日期:2019-04-17

第一作者:周卓钊(1987—),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

引用格式:周卓钊,袁平.从“表征”到“共生”:共生认知心理学探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8(6):104-113.

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共生认知(enactive cognition)构筑的“4E认知”联盟,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情绪性认知(affective cognition)、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以及动力系统理论(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等研究新纲领相继产生,标志着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革命已经发生。共生认知心理学作为这场革命风暴当中反表征主义的旗手备受各学科的关注^[1-3]。近年来,国内尽管已有学者^[4-7]从不同方面对该学派理论进行了论述,但不全面,缺乏从学派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其内涵并给予客观的评价,本文对此予以补充。

一、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形成

共生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心理学是兴起于认知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学派,否定认知主义、联结主义、新联结主义主导的“表征”研究纲领并批判其研究人类真实认知水平的不合理性,重新倡导一种彻底的非表征研究原则。

该学派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具身思潮”运动,成形于“4E认知”研究以及“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等理论相继兴起的世纪之交,目前又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影响了许多其他学科理论建设。正如所有的理论产生离不开其时代精神的培育一样,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形成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1)哲学、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共同孕育。首先是受米德、杜威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哲学,胡塞尔的发生、生成现象学哲学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约纳斯(Jonas)的生命现象学和东方佛教文化哲学的共同孕育。其次是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实验研究、二阶控制论的系统科学以及动力系统理论的出现和人工智能领域进化机器人的开发与运用、数学中微分方程发展的科学成果对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再次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格式塔心理学、杜威机能主义心理学和吉布森生态心理学的内部变革力量。(2)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逐渐增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层之

间矛盾不断加剧,已有的理论无法满足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和存在本身日益增长的探索兴趣,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了人本主义的回归,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生更加剧了对传统思维理性的反思和对当下现实生活尤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关注的理论转型。随着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和新联结主义共同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定位和人机类比研究隐喻受到认知科学专家的质疑和发难后,其符合论的认识论和精确计算的认知机制观点逐渐被卷入争论中。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具身动力运动”便是这种争论的集中体现,而这也必然成为共生认知心理学形成的重要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瓦雷拉(F. J. Varela)在和导师马拉图拉(Maratura)合作进行的生物学细胞分子研究中,发现了生命“自噬”现象。他查阅了诸多学术文献后,发现其他学科亦有类似的现象,因此他在其著作《具身心灵(embodied mind)》^[8]中试图将这种“自噬”现象拓展为人类生命的基本生存形式,即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发展。人类就是以新陈代谢这种最基本的单元来保持与外界联系,设计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外在世界(环境),这就是著名的“自创生(Autopoesis)”理论。这个过程可以借助于瓦雷拉所设立的“自治性(Autonomy)”模型来实现。他在书中首次以“enaction”(原意是生成、创造)一词作为认知科学的一个新范式理论主张,因而此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共生认知心理学的诞生。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轰动,随之影响了其他学科如教育、心理治疗、音乐等领域的理论发展^{[1][9][10]}。此后,瓦雷拉通过参与创办《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学术期刊,参与主持主题分别为“自治性模型的人工智能”^[11]、“认知科学和现象学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将他的自治性模型以及东西方哲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案进行推广。后继者汤普森(2007)以“认知和生命的深连续”命题完善了“自创生”理论^[12]。诺伊(2004)、赫托(2013)、德耶格(2010)、迪堡罗(2010)、弗洛斯(2010)等人以瓦雷拉倡导的“认知即行为(action)”作为口号,通过开办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撰写学术论文、开展学术会议等形式构筑共生认知心理学阵营并构建其版图^[13]。至此,共生认知心理学

派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二、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一)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当前,西方对于共生认知心理学研究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并逐步发展出自创生、感觉运动、激进化共生、交互共生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案,这些研究方案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批判和超越传统表征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原则,完善和拓展共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路线。从其内在逻辑来看,自创生研究方案是纲领性研究方案,是交互共生研究方案的继承和拓展。感觉运动研究方案是与自创生研究方案并驾齐驱但又相互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研究方案,开辟了另一条研究道路。激进化共生研究方案修正了自创生和感觉运动两个研究方案。

共生认知心理学家帝保罗·弗洛斯等人于 2006 年在欧洲发起并创办了“共生学校(enaction school)”,该暑期学校通过连续举办四年历时一周的暑期学术会议^[14],共同商讨共生认知心理学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以发展更为统一和成熟的研究纲领为目标,因其联络了包括人工智能、教育学、音乐学者等领域的专家,因此,“该共生学校”可视为到目前为止共生认知心理学最大的一个民间团体。2014 年,共生认知心理学家齐聚美国洛杉矶,举办了主题为“共生主义不同形态”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为了纪念美国心理学大会成立 50 周年的专题研讨会。该会议专门就共生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案之间存在较大理论差异以及可能由此出现共生认知心理学为其他“3E 认知”心理学所整合或者替代的危机进行了讨论,以更好发展和完善共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纲领。这些公开集体性的活动都在有力推动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如此,在“百度学术”中输入“enactivism”的期刊文献就多达 7260 篇,输入“enactive cognition”则显示 46800 条文献记录,仅 2019 年以来发表的文献就有 7 篇,其中不乏美国心理学界顶尖学术期刊。由此可见,共生认知心理学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且研究兴趣持续升温。

较之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葛鲁嘉教授最早关注于此,并将其首次翻译为“共生主义”^[15]。李其维教授也对此有过探讨^[16]。但对此研究较为权威的应该是李恒威教授,他主导

翻译了《具身心智》、《生命中的心智》^{[8][12]}等重要著作,便于国内学者后继的研究。此外,刘晓力教授、李建会教授及其团队也从哲学的角度对此分别进行了研究^{[4][7]}。其中李建会本人还于 2018 年出版了代表其近年来研究成果的著作^[7]。同时,目前从“中国知网”上可以搜索到关于此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7][18]},但绝大多数学者均以“生成认知”对其命名。翻译的不一致也反映出国内学者对此理解不统一甚至是以偏概全的现象,研究主题分散不集中制约了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偏重自身学科视角而忽略其全面意义,甚至还有误读、误解之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立足于共生认知心理学家的原著和文献,客观全面对其发展的研究路线进行整理和概括。

(二) 共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案

1. 自创生共生研究方案

瓦雷拉的自创生研究方案历经了四个阶段,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自创生”系统科学模型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佛教文化的正念觉知技术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方法以及汤普森“认知—生命深连续命题”阶段^[12]。这也正是瓦雷拉思想从“二阶控制论”向“现象学认识论”的转变^[19]。他致力于研究人的内在经验,早期将其类比于操作闭合的自治性系统,并界定为普遍的生命形式。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中,生命体可以产生出“关系域”,即自主获得生活过程中个体与外界互动的某种规范。这是一种“意义生成(sense-making)”的过程,换句话说,生命体是根据其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价值观而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瓦雷拉要把价值和主体性作为不可或缺的生命现象重新引入认知研究中。这与康德哲学中将生命体视为一种基于自身内在相互制约作用机制的自主系统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康德内在目的论最早促成了共生认知心理学中这种“规范性转向”。

随着瓦雷拉本人多年的修行,他后来发现这种经验来源于日常现实生活,只有采取佛教当中的“中观之道”方式方能获取^[20],而这种方式的具体方法就是佛教当中的正念觉知。瓦雷拉将正念觉知运用于调和现象学“第一人称”研究方法和神经科

学“第三人称”研究方法的方案中,提出了瓦氏“神经现象学”研究方法,这是调和认知科学中人文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的首次大胆创新实践,并在测查癫痫病人癫痫病发先兆的实验中得以应用^[21]。

自创生共生研究方案代表着认知心理学中现象学、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的转向,构建了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初步框架,拓宽了认知科学研究的范围,以探索高层次认知的人类经验(意识、意向性、移情、情绪、语言和同情心等)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论为己任,其关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的调和对其后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 感觉运动共生研究方案

共生认知心理学家诺伊与迈因、奥瑞根不满于自创生研究方案中早期建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的“自创生”理论,因其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哲学特征,这些乃共生主义所拒斥。同时对“神经现象学”方法对外部经验的不可验证性提出了质疑。基于此,他们共同开创了一种非系统科学研究视角的感觉运动研究方案。该研究方案以诺伊的《行为中的知觉(*Action in perception*)》^[22]一书为形成标志,以人类的知觉经验(perception experience)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感觉运动依赖理论(sensorimotor contingencies)论述人类知觉经验与行为(action)之间的共生共变关系。这个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即感觉运动知识(sensorimotor knowledge)和感觉运动技能(sensorimotor skill)。前者是一种行动前的能动感受知识,这是一种默会(tacit)知识,例如,我们能够看到被栅栏部分遮住了的猫或者是西红柿,都是依赖于我们能够运用行动的能力所获取的一种知识。所以,感觉运动技能就是这样一种具身的与环境不断实践而产生认知的能力。再如,在Held和Hein实验中,拉马车的小猫较之于坐马车的小猫能更快完成任务,说明知觉经验还要依赖于感觉运动技能而获得。因此,知觉经验由感觉、运动以及知觉过程之间连续的和互惠的非线性互动,并由运动行为、感觉刺激以及实践性知识构成。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是进化机器人模型(evolutionary robotics model)技术。进化机器人仿真模型最初运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后经Beer改进引进认知科学研究中。进化机器人依赖于人工

神经网络、进化算法和Brooks设计的基于行为的机器人技术的成熟而发展,其最大优势是通过将机器人这种“代理(agent)人”替换成“真实的人”,能为人类认知研究提供具有微型感觉运动的模型,又因为人类认知发展也是和其他生物一样肇始于古老时期,因而对于这种生物体共有认知能力基础的挖掘可以佐证人类认知发展轨迹的研究理论。诺伊也认为,该技术能深刻体现对动态连续不稳定时态和空间的过程^[22]。而另一种为感觉运动研究方案所青睐的技术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触觉性视觉感知替代”技术(TVSS)。借助于实验室环境,能够对“感知觉依赖于具身行为”的理论主张^[23]。基于此,诺伊等人认为这两种方法或技术均可以提供一种“感觉运动微观模型”的经验^[24]。

感觉运动共生研究方案继承了瓦雷拉的“认知即行为”的研究主张,打开了通往观察人类经验和行为之间另一条共生关系的研究之路,是认知心理学中现象学转向的延续。而恪守“行为导向”的知觉共生观,又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中的实用主义转向。

3. 激进化共生研究方案

激进共生研究方案是在前两个研究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赫托认为“自创生”研究方案当中“关系域”产生和“意义生成”含有对表征的承诺,而“感觉运动研究方案”当中由于强调“感觉运动知识”,这就陷入一种命题式的表征含义当中。在赫托看来,界定表征有两个重要前提,即内容和载体。载体是内容的载体,也就是说只要有内在的、有内容的心理机制,表征就可以界定。因此,赫托以“无内容基本知觉(non-content basic perception)”概念为突破口,试图解决感觉运动共生研究方案当中表征清除不彻底的问题。他认为,视听觉、触摸、抓握等基本知觉是没有内容的。如同Brooks的“无内容智能机器人”形态,基本的知觉是通过个体与外界持续的具身实践而获得,并不需要借助于内在的表征信息“存储”功能。这样,赫托用激进的非“内容关涉”(内部信息加工)、非概念化(先定的)的外在活动特点的词语来有效避免感觉运动依赖理论陷入表征理论的困境中。但是在高级知觉阶段,赫托认为修正的“表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25]。这种表征存在于他意欲强调的“面对面”人际交往之间的“叙事”能

力中,这是语言活动的“脚手架”功能的体现。他运用这种能力来研究社交人际间的知觉水平。在赫托看来,社交中我们相互解释(叙事)的能力的核心是通过使用“常识(common sense)”或“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来完成的,即可理解为用一种“日常的(everyday)”,而不是“科学的(scientific)”办法去解释交际双方对彼此心智(mindness)的评价(appreciation)。尽管学界对于哪些认知过程支持我们的民众心理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儿童时期是如何发展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争论,但对于其中包含了民众心理学这样的能力却存在着显著的共识。学界大多数的讨论都基于这样的观点:民众心理学主要是一种将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进行归因的能力,这样可以预测其他个体心理并解释其他个体的行为。这种能力通常被认为是所有社交生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人类社交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赫托企图修正关于“民众心理学”的认识。在近年来的研究^[26]中,他提出叙事练习假设(Narrative Practice Hypothesis, NPH),认为人与人面对面的“交际”是通过具身的实践行为(叙事)对对方行为故事文本进行解读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叙事文本为中心的一种静态交流。这就是他批判认知主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心智阅读(mindreading)的“内心推导(theory of theory)”或者“模仿(simulation)”技术。赫托以一种外在主义的认识方式对社交中心智阅读的理解又构成了激进化在社会维度层面的实践。基于此,赫托将民众心理学这种人文科学(日常生活水平)和认知科学这种自然科学进行调和研究^[26],他已经在精神病学中进行了实践,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对瓦雷拉倡导的调和人文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主张的践行。

激进化共生研究方案是共生认知心理学在个体层面理论不断完善和在人际交往中调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效实践,打开了通往社会维度研究的通道。赫托的庞大理论体系显得松散而包容,可视为“对所有拒绝表征认知理论的大整合”^[27],是对于面对面人际交往中叙事练习技术的强调,也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中实用主义的转向。

4. 交互共生研究方案

德耶格等人的交互共生研究方案是共生认知心

理学在社会维度的实践,也是对自创生研究方案的一种延伸。该研究方案的理念是人与人的交互过程并不能还原为“面对面”抑或“身体对身体”的交互过程,即不能还原为赫托所论的每个互动参与者自身的感受生成(sense-making),而是生成关于共享意义的形式,即“参与式感受生成(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他们认为,这种交互强调了参与者优于“第二代参与者间限制”并发展出它们自己的自治性。德耶格等人特别强调人们在现实社会间的交际协同,称之为“参与者间持续的、非偶然性耦合”。这种“耦合”概念和瓦雷拉一样,都是借助于动力系统理论而形成的。形式上,它与瓦雷拉的单个自治性系统一样,只不过这里指的是多个系统间持续互相起作用影响的过程。交互共生方案强调身体性和情感性耦合,因为在社会认知的高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是通过情感和价值进行相互协同发展的具身互动,移情和濡化就是这样一种社交过程。他们认为,在人生中,每个人都会发展出和他人交互的不同模式,当然这依赖于每个人与他人瞬时的协同交互作用,因为人就是在不断社交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建立起社交互动关系,每个人就会进入到一种交互协同过程中,双方必然遵循自治性系统的规范,而就算任何一方想退出这种社交也依然受此过程影响,例如,社交中绝大多数人会为了避免尴尬敷衍地维持着某一段社交关系,在德耶格等人看来,这就是一种社会认知中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不同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就在“参与式生成(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过程中被建构出来。交互共生方案还强调可以通过瞬时交互直接理解他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也不可能以传统民众心理学中“理论论”或者“模仿论”去体会并且理解他人,而是通过具身互动的“规范”来直接理解他人,也就是我们能直接从他人身体姿态传递的信息去获取他人的情感和意向信息。另外,这个观点借鉴于现象学,特别是舍勒等人关于交互主体和移情方面的理论。基于以上论断,德耶格等人依然推崇类似于“进化机器人模型”的仿真技术。在德耶格等人看来,诺伊采用的只是进化机器人仿真模型的雏形,不同于个人实验设计的诺伊的实验方法,德耶格改进成了双人的人机互动实验,且将自变量由

“最小单元感觉运动”改成“最小单元交互共生”,以得到两个被试或多个被试间通过不指明的协同实现(是一种双盲实验)过程数据。除此以外,进化机器人仿真技术的高级成果亦可以提供更为严谨和真实的人类认知模拟技术^[28]。

交互共生研究方案直接涉及社会认知领域共生认知范式的实践,较为有力地回击了认知主义学者对共生认知范式“个体论认知”批判的论断,又因为借用了诺伊的研究方法,因而可视为是感觉运动研究方案在社会认知维度的实践和验证。同时对于社会协同交互规范性的强调和社会认知情感性的表述,又体现出了认知心理学中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的转向。

以上论述是基于共生认知心理学的狭义探讨的。若从广义而言,共生认知心理学应该包括一切认知研究的反表征研究纲领,它更像是一个不同学科的整合体。这种整合性使得不同学科的反表征研究成果能够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如上所述,机器人学当中的进化机器人仿真技术推开了心理学研究认知的新窗口,而动力系统理论又为这种技术在心理学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样,共生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方案均对人工智能中“具身”或者“共生”机器人的研发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成果。可以说,正是随着当前对认知动态过程研究兴趣的持续升温,才使得反表征认知研究纲领如此受到关注,因而,共生认知心理学学派的理论内涵得以澄清。

三、共生认知心理学理论内涵

不同进路的研究方案实则有共同的理论内涵:致力于人的经验的研究,并以现象学、实用主义、规范主义三种转向,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实现对传统以表征为研究原则的研究范式(简称“表征认知心理学”)中功能主义身心关系论、人机类比研究隐喻、实验室研究定位、表征认知的本质、信息计算的认知机制等五个维度的彻底转变。因而,较之其他3E认知,该认知新学派在反表征主义上更为激进,因而更具革命性。这样来看,共生认知心理学应是其他3E认知的最高层次。

(一)现象学转向——本体论层面的转变

现象学是共生认知心理学赖以发展的最为主要

的、根本的哲学基础。从胡塞尔的发生、生成现象学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约纳斯的活机论生命现象学等,均促成了瓦雷拉创立共生认知心理学的动因。而从其影响层面来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改变了实验室的研究定位,改变了传统认知研究中自在世界观和人机类比的面貌;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改变了内在主义认知路线,将视线从大脑内部转移到身体这个最基本单元上来;约纳斯活机论主要给予了认知即生命的最为主要思想的构建。据此分析,现象学是从本体论上促成认知心理学转向的基础。

1. 认知的主体观从人机类比到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机器的人到生成、鲜活的人,二是从个体的人到社会的人。正因为表征认知范式是在“亚人(subpersonal)”层面开展的研究^[29],因而,计算机和软件的操作过程才能应用于颅内认知的人脑加工过程,这样较之心理主义和行为主义可更为合理地、科学地探索内部心理过程这个“黑箱子”。但是人非机器,亦不是计算机的硬件。历史上,塞尔的“中文屋”、普特南的“僵尸人”、查尔莫斯“缸中脑”思想实验对此有过重要的批判,具身认知学者也对此有过质疑。但是共生认知学者做法最为彻底,从现象学引路,直接将“人”及其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个体是鲜活的、后天生成的,并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例如瓦雷拉(Varela)在历史和环境下不断实践生成的人的经验;汤普森(Thompson)、诺伊(Noë)、赫托(Hutto)、德耶格(De Jaegher)是通过行为(action)与瞬息变化社会环境不断耦合生成的人的知觉经验。而社会的人是指主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不断“参与式感觉生成(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的人^[30],换句话说,认知就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社交互动中产生出来的。自此,传统认知心理学中企图以普适性和凝固性为特征的机器类比人类,实现为科学实验铺桥搭路的目标,实现对科学主义客观研究方式的追求;而认知主义者质疑和挑战共生认知心理学中缺乏社会认知的言论的事实不攻自破。同时,这也拓宽了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将心智(mind)研究与生命之为生的过程(living processes)、感觉生成(sense-making)、习惯(habits)、人类经验(experience)、情感的(affective)、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es)、语言(language)等方面相关联^[31]。

2. 认知的身心观从离身认知到具身、嵌入认知

人机类比的研究隐喻给予了离身认知的身心关系论,也是对笛卡尔的二元论传统的承继,但由于其不能反映人类认知真实面目而陷入了困境当中。共生认知学者看到了具身认知在解决离身认知困境的合理性,并适当拓展了其内涵,即身体除了在认知发生中提供存在的媒介外,还成为认知主体与外界不断交互的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经验种类^[32]的重要来源。其思想应追溯至康德先验论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先验心理学派中关于“身体图式”抑或“生理结构图式”的学说。由于该观点更强调与外界的交互作用,也可以认为是拓展了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同时也超越了具身认知理论本身。

嵌入认知论(embedded cognition)作为反对“部分环境构成认知过程”的激进外部主义的延展认知论(extended cognition),由于重视外部环境对认知的重要作用,亦为赫托等共生认知心理学家所青睐。与具身认知强调了身体参与认知过程的角色一样,嵌入认知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心灵与世界关系的共生认知,其是对身心关系中“心与世关系”的拓展。不过共生认知所主张的心物关系论是对身心一体论、心世交互、身世交互的更高层次的整合。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心、身、世是一体的,主体与客体关系遵循一种关系整体论。

3. 认知的世界观从面向自然到面向日常生活

传统认知心理学中的实验室研究定位实则追寻一种先定的、自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恪守科学主义严格且能反复验证的研究模式,才能成功解决心理主义二元论和行为主义纯粹“刺激—反应”函数的困境。但这种曾取得巨大成功的模式不适用于人,只适用于自然事物。共生认知学者将研究定位于日常生活是解决“笛卡尔式焦虑”的最根本办法,是对基础主义的消除。正如瓦雷拉等看到的佛教当中“无根之基”和“中观之道”的教义所示,世界本无既定的根基。因而,走向“无根基”的日常生活,就是仅留有人类社会活动烙印和走向充满价值、动机、志向的世界。这样,认知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被形式世界所捆

绑^[8]。这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一种主客体的共生共融。这种世界观和主客体后天共生而成的认识论充分体现在瓦雷拉、汤普森的“自创生”模型和诺伊等动力系统模型中。

(二) 规范主义转向——认识论层面的转变

规范主义最早出现在瓦雷拉等人^{[33][34]}的文献中。从康德将“自组织”概念引入生物学再到汉斯·约纳斯活机论的生命现象学,这些都为瓦雷拉的自创生理论、自治性系统模型和“认知即生命过程”等共生认知理论雏形提供了思路。尽管共生认知学者将康德目的论中先验成分进行了剔除,但不可否认其共同的哲学主张,即强调认知(或生命过程)是主体按照自身与环境交互作用共生出来的规范和价值来约束和运行的,是一种共生实践观的认识论,区别于传统认知心理学中价值中立的认识论。该理论倡导一种价值有涉的认识论转向,主要体现在对表征的认知本质观两个方面的批判和超越上。

第一,外在主义和共生主义对内在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认知的表征本质观是综合先定自然的世界观和认知内在主义(Internalism)的衍生品。信息在头脑中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方式呈现,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和新联结主义分别以序列方式和分布方式进行表征。赫托等共生认知心理学家吸收了延展认知论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观点,即外在的环境可以作为“脚手架”工具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卸载”认知负担。也就是说,心理与世界、身体与世界、心理与身体共同生成时观照到外部环境可以被认知创生出来并被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认知过程完成。在共生认知心理学家看来,认知和环境之间由于同时受到双方建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认知就是一种随着环境即时即刻变化的具身行为技术(skill)。我们人类也在这种和瞬息万变的世界“打交道”的技术中被不断创造出来。因此,和延展认知论中环境的构成本质不同,共生认知论强调环境不是一种“上手实践”,而是不断“耦合生成”的实践。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共同协变”的实践观,由于没有先定的心灵或者世界的存在,表征的性质亦无处藏身,这就彻底地将表征清除出去。

第二,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间的交互视角对传统认知心理学中“观察者”视角的批判和超越。后者

的研究方式不仅制约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更遮蔽了认知是社会性个体之间带有情感的介入和受协同规范过程的影响的本质^[35]。德耶格等人关于通过情感介入社会互动的规范性可以直接识别他人心智而无需民众心理学当中的“心智阅读”技巧的论断^[36],亦是认知非表征本质观、非符合论认识论的更高层次体现。

(三) 实用主义转向——方法论层面的转变

实用主义代表符合目的论的认识论,强调能够为之所用的哲学。随着对人机类比隐喻的质疑,传统认知心理学中表征的认知本质观衍生出来的串行或者并行的信息加工认知机制不合理性亦被揭示出来。认知科学需要一个认知实用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可以通过“行动核心性假说”来刻画,这一假说既是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37]。早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经典的研究已经强调了感知和行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38][39]}。但是这种论断得以受到关注还是在此学派当中。共生认知心理学的每一条研究路线都恪守并深化“认知即行为”的研究主张,对于这种始终处于动态过程的认知机制的计算需依赖动力系统理论研究技术以及微分方程组来实现。动力系统的“瓦特离心控制器”隐喻挑战传统认知机制的“计算机”隐喻,与神经认知的自组织的传统观念不同,动力系统隐喻是一个服从于初始条件和各种内生和内生参数的具身的行为,因此神经集合和大尺度整合总是根植于特定的身体和环境语境中并被它们调节^[5]。根据动力学分析,这种过程遵循的要求是:唯有机器各个部位相互触发才能正常工作,这样可实现自我调节和控制。这是对行为受认知引导、认知受行为塑造的最为形象的揭示。

四、评价

共生认知心理学还在发展之中,现对其进行定论还尚早。当前来看,共生认知心理学对传统认知心理学研究纲领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心理学理论建设的历史功与过和现实是与非已能够窥见一二。

第一,共生认知心理学对传统认知研究纲领的批判和超越。共生认知心理学从现象学、实用主义、规范主义转向引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转变了传统认知心理学自在的世界观、符合论的认识

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研究方式,并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该研究纲领还将传统认知科学所遗弃或者被还原的意识、意向性、目的、社交、情感等主题又重新纳入视野,还倡导了一种价值有涉的研究立场。但也导致其陷入争议中:Holton D. L. 将其方法论作为建构主义加具身认知的一种简单拼凑^[40],Michaelian K. 等人认为这种研究纲领沿用认知主义当中的例子来反驳认知主义范式^[41],其所谓的变革是不成立的。Grunsvén J. V. 将其视为一种目前来看还不成熟的“第二人称”方法论的进路^[42]。Scarfone D. 亦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主张,它还不能构成一种革命^[43],持与此类似观点的还有 Shapiro, 认为其最多是对传统认知科学范式的一种完善和拓展^[6]。由此可知,在批判传统认知范式的维度上,该范式的确还缺乏适合于理论主张的研究技术,认为仍有必要向着定量的、可验证的、更高级的实验方法发展^[44],加之进化算法和微分方程分别是进化机器人仿真模型和动力系统研究当中的核心技术,共生认知心理学亦可能如其反对的传统认知心理学一样陷入由表征研究纲领所衍生出的计算主义研究方式的窠臼中。同时各研究方案间具体研究方法存在的较大差异性和技术使用难度大等弊端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范式成为统一研究纲领,况且这些研究技术是否适合于“人”的研究还有待商榷。另外,共生认知学者的研究方案中还未能有效整合4E认知的理论内涵,这就没有看到其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无疑会大大降低其范式应有的理论高度而可能面临着为其他3E认知所统合或者消解的结果^{[45][46]}。

第二,在对心理学理论建设上,共生认知心理学迎合了认知心理学研究中人本主义的回归趋势,体现在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成性、独特个性、鲜活特征和社会实践、历史风味等本质不同程度的张扬。人与自然物既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人本来源于自然界,自然兼具了自然物所应有的先定和普适性特征、规律。但共生认知心理学不断消解这种先定和表征的基础主义,也就人为地抹杀了这种同而强调了异,从思维逻辑来看,这无疑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视角,体现的是自相矛盾的“物种”逻辑。共生认知心理学家将人视为一种自动机或者自治性组

织系统,并借鉴机器人学的研究技术体现出来。显然,再好的自动机也只能是机械的、无头脑的^[47]。由此来看,这是“新瓶装旧酒”式的人机类比研究隐喻,与自身强调的真实的人相互冲突和矛盾。此外,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的转向可能限制了该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因为以杜威、詹姆斯等人为主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文科学主义方法论最为明显的态度就是为它们保留了合理存在的空间。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所有心理学派都可以在实用主义心理学中找到存在的空间,彼此相安无事,没有垄断和统一,但是一旦要进入詹姆斯所谓的“公共走廊”中,那就都得努力证明其有用的价值,所以这是一种兼容并蓄、折中包容的方法论哲学。由此可见,共生认知心理学家遵循的“介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或者称为“第二人称”的方法论亦是此种体现。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整合方式,在心理学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整合方式,例如二重心理学的“懒汉式”整合^[48]、人本主义层次整合,但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真正整合的方法论不再是纯粹的科学主义或者人文科学主义方法论,而是彻底的科学主义和人文科学主义方法论。彻底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必然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充分体现人的各种本质特征。而彻底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进行的探索必然是符合科学规范的,最终实现彻底的科学主义以及彻底的人文主义的整合。唯有如此,才有助于彻底摆脱“物种”逻辑思维方式,实现“人种”逻辑的转变^[49]。

未来,共生认知心理学须克服方法论上对人的本质揭示的不足以及研究技术与理论不完全匹配之弊,整合各研究方案理论和研究技术以产生更加丰富的实证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去看待人的本质、真理,发展出更为成熟的研究技术,以探寻人自身创造性的生存活动,即在实践中生成、展开和完善人的本质^[49]。

参考文献:

- [1] KRUEGER J W. Doing things with music[J]. *Phenomenology &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1, 10(1): 1-22.
- [2] TOWERS J, MARTIN L. Ena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collectivity[J]. *ZDM*, 2014, 47(2): 1-10.
- [3] FLINT T, TURNER P. Enactive appropriation[J]. *Ai & Society*, 2016, 31(1): 41-49.
- [4] 刘晓力, 孟伟. 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身体、认知与世界[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29-31.
- [5] 武建峰. 认知生成主义的哲学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5.
- [6] 李恒威, 肖云龙. 论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4): 37-52.
- [7] 李建会. 心灵的形式化及其挑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 [8] 瓦雷拉, 汤普森, 罗施, 等. 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3.
- [9] DAVIS B. Why teach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enactivist theory[J].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1995, 15(2): 2-9.
- [10] OBERG G K, NORMANN B, GALLAGHER S. Embodied - enactive clinical reasoning in physical therapy [J]. *Physiotherapy practice*, 2015, 31(4): 244-252.
- [11] VARELA F J, BOURGINE P. Toward a Practice of Autonomous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Lif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 [12] 埃文·汤普森. 生命中的心智: 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5-6.
- [13] JOHN S, OLIVIER G, EZEQUIEL A D P. Enac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Cognitive Science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42-49.
- [14] Enaction School[EB/OL]. (2010-06-27). <http://www.enactionschool.com>.
- [15] 葛鲁嘉. 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演变[J]. *国外社会科学*, 1995(10): 63-66.
- [16] 李其维.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 *心理学报*, 2008, 40(12): 1306-1327.
- [17] 刘从胜. 瓦雷拉生成认知观的理论探析及其意义[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2.
- [18] 李亚文. 生成认知的基本观念及其实证[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2.
- [19] FROESE T. From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to 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 Varela's turn from epistemology to phenomenology[J].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1, 28(6): 631-645.
- [20] LUTZ A, THOMPSON E. Neurophenomenology integrating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brain dynamics in the neuroscience of consciousness[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3, 1(9): 31-52.
- [21] KYSELO M. The enactive approach and disorders of the self - the case of schizophrenia[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6, 15(4): 591-616.

- [22] NOË A. Action in percep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
- [23] AUVRAY M, LENAY C, STEWART J.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in a minimalist virtual environment[J].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09, 27(1): 32–47.
- [24] NOË A.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in time[J]. *Analysis*, 2006, 66(289): 26–32.
- [25] HUTTOD D. Radically enactive cognition in our grasp[J]. *Semiconductors*, 2013, 40(8): 869–874.
- [26] HUTTOD D. Psychology unified: from folk psychology to radical enactivism[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13, 17(2): 174–178.
- [27] HUTTO D D. A Reconciliation for the future of psychiatry: both folk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J]. *Front psychiatry*, 2016, 7(4): 12.
- [28] ROHDE M. Evolutionary robotics simulation models in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ur and cognition[D].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8.
- [29] DENNETT D C. The intentional stanc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 [30] JAEGERH D, PAOLO E D. 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J]. *Phenomenology &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7, 6(4): 485–507.
- [31] DE JAEGER H, FROESE T. On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individual agency[J]. *Adaptive behavior*, 2009, 17(5): 444–460.
- [32] ANDERSON M L. Embodied cognition: a field guide[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3, 149(1): 91–130.
- [33] WEBER A, VARELA F J. Life after Kant: natural purposes and the autopoietic foundations of biological individuality[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2, 1(2): 97–125.
- [34] NATHANIEL F B. The normative turn in enactive theory: an examination of its roots and implications[J]. *Topoi*, 2017, 36(3): 431–443.
- [35] DE JAEGER H. How we affect each other: Michel Henry's "pathos-with" and the enactive approach to intersubjectivity[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15, 22(1): 112–132.
- [36] HARRIS C S. Perceptual adaptation to inverted, reversed, and displaced vis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5, 72(6): 419–463.
- [37] 让·米歇尔·怀尔, 黄远帆, 胡扬. 认知实用主义问题[J]. *哲学分析*, 2016, 7(3): 111–134.
- [38] TAYLOR B. The behavioral basis of percep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39] HELD R, HEIN A. Movement-produced stimu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ly guided behavior[J]. *J comp physiol psychol*, 1963, 56(5): 872–876.
- [40] HOLTON D L. Constructivism + embodied cognition = enactivis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 change[J]. *Recuperado a partir de*, 2010.
- [41] MICHAELIAN K, ANDRESANT A. Memory without content? Radical enactivism and (post)causal theories of memory[J]. *Synthese*, 2019, 7(3): 1–29.
- [42] GRUNSVENV Janna. Enactivism, second – person engagement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7, 17(1): 131–156.
- [43] SCARFONE D. Enactive cognition, the unconscious, and time [J].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016, 36(5): 388–397.
- [44] JESUS D P. Can the revolution be optimised? Oh yes it can! But, maybe not. Report on the one day symposium on “Varieties of Enactivism” [J]. *Connection science*, 2014, 26(3): 293–296.
- [45] ROWLANDS M.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extended-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 [46] MENARY R.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4E cognition [J]. *Phenomenology &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0, 9(4): 459–463.
- [47] 陆士杰. 控制论与心理学[J]. *青海师专学报*, 1982(1): 119–125.
- [48] 戴黑. 心理学史: 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09.
- [49] 彭运石. 人的消解与重构——西方心理学方法论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肖 晗]